

教育研究集刊
第六十三輯第二期 2017年6月 頁135-143

書評：Henry A. Giroux 著《可拋棄式青年、種族化的記憶與殘暴文化》

Book Review: *Disposable Youth, Racialized Memories, and the Culture of Cruelty*

鍾明倫



一、作者的介紹與專書的寫作脈絡

Giroux 作為一位文化政治的批判教育學者，他在這一本書中，嘗試從自己的經驗出發，論證美國青年所面對的處境。Giroux 將這一群被資本主義壓迫的青年稱為「可拋棄式的青年」（Disposable Youth），這個詞彙就是在控訴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宰制」（domination）、「剝削」（exploitation）、「壓迫」（oppression）工人階級青年，他在第二章與第三章都特別提到自身「種族化的經驗」與「階級壓迫」的關係。在拆解被壓迫的關係中，其實種族的自我認同（racial identities）也是經常被忽略的。過去種族的研究二分為「黑人」與「白人」或「美裔公民」與「非美裔公民／移民者」，這樣的區分都簡化「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很容易理解為特定族群的對立，而忽略「族群的階級屬性」（例如：白人／黑人的中產／工人階級），以及「階級的族群屬性」（中產／工人階級的黑人／白人）的分析，以及「階級」與「族群」間複雜的互動關係。

這一篇的書評，筆者將嘗試從幾個角度重新思考Giroux的觀點與論證。首先，筆者將介紹不同章節的主要論點；再者，筆者將從作者的論點中爬梳本書的「知識論邏輯」與「方法論的邏輯」，其中，知識論將討論「作者自身與他者的經驗」與「壓迫性社會事實與社會事件」間的關係，筆者也將繼續分析「具體的生命經驗」與「抽象概念」間的關係為何（例如：資本主義的運作如何產製「可拋棄式青年」）；從另外一個面向，筆者也將討論建構知識的方法論基礎，包括本文大量的使用「第一人稱」的方式陳述美國青年的處境，其陳述方式如何回應「客觀性」（objectivity）的質疑，Giroux詮釋與歸納的經驗，也援引大量左派的批判概念與學術語言，Giroux的論述結合「經驗歸納邏輯」（從自己與他人的經驗出發，並結合雜誌與報紙媒體的報導）與「概念演繹邏輯」（資本主義的商品化邏輯與新自由主義的政府治理），在文本中交叉穿梭，然而這樣的論證形式是否足以支撐作者的主要論證——美國的弱勢青年已經成為「博奕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的祭品，隨時都可能被社會當作商品「拋棄」（disposability）。

二、本書各章節的主要論點

Giroux在第一章開宗明義指出，美國青年所面對的道德與結構的災難，是由「經濟達爾文主義」（economic Darwinism）與「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思維的侵略所驅動，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的信仰也造成「博奕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的出現。再者，新的威權治理結構也將「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轉為「懲戒性的國家」（punishing state），企圖透過社會控制的手段，確保國家的政治與道德秩序。在這樣的結構底下，雖然美國的底層青年並非完全地被「美國夢」所排除，但是，他們逐漸被視為無用的社會冗員，並且是可以隨時「被社會拋棄的」（disposable）的廢棄物。因此，Giroux強調，大學作為「民主的公共領域」（democratic public sphere），應該重新思考教導學生如何治理校園，取代如何被校園治理。政府也應該削減監獄與軍備的開支，提供更多的人力資源進入校園（包括教師、職員、社區工作者等），以降低底層學生從「學校通往監獄」（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比例。

第二章，Giroux開始從經驗的角度陳述美國底層的青年如何被推入一個被

拋棄的結構當中。在這個結構底下，美國底層青年已經逐漸放棄追逐希望與夢想，他們將重心移轉至如何努力地生存下去。Giroux也對於美國的民主提出深刻的批判，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在資本主義民主結構的包裝下開啟了「人力垃圾管理」（human waste management）的機制，政治的「商品化」趨勢逼迫底層的美國青年走向邊緣與被拋棄的命運，而知識份子、學生、工人團體與工人階級的「道德勇氣」（civic courage）更是從公共領域中逐漸退卻。第三章，Giroux嘗試以第一人稱的方式陳述自己的種族化經驗與階級認同。他提到「階級」和「種族」是一種「表現性分類」（performative categories），即為「個體自我表現的形式」（forms of individual self-expression），包括姿態、言說與行動。這兩個概念不只是「名詞」，而是如何「陳述」（narrate）自身。Giroux從自己的種族經驗與階級的認同反省跨「越種族邊界」（crossing racial border）的挑戰，他也提出「文化教育學」（culture pedagogy）的概念，強調「文化機制」（cultural apparatus）與「文化資本中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 within the notion of social capital）都可能是潛在的壓迫機制，因此，Giroux認為應該反省與批判主流媒體所塑造的「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的圖像，這些圖像的再現可能都被包裝在「言論自由」外衣之下的新自由主義論述之中。職是之故，Giroux在第二章與第三章之中，從社會現象的分析走入個體化的經驗，並連結到結構的不正義，論證青年處於被壓迫結構的無奈，並重新思考美國的民主結構與權力關係的疆界。

Giroux在第四章與第五章開始進行抽象概念的辯證性討論，第四章提出「殘暴文化」（culture of cruelty）與「羞辱性的政治」（politics of humiliation）之概念。「殘暴文化」是一種適者生存心理機制，例如：政治人物經常會透過「羞辱性的論述」合法化「殘暴的文化」，並強化新自由主義公共教育的影響，這些論述也鄙視那些無法接受將市場和正義與公平視為同義詞的人，或是無法接受個體化市場機制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的人。因此，競爭與懲戒性的心理機制將逐漸滲透進入政治與制度當中，決定人們的生與死。Giroux認為，「激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的實踐將有助於挑戰不同形式的壓迫、剝削與社會排除。第五章更深入地探討美國青年應該如何反抗與回應「博奕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的商品化運作機制與「新自由主義的教育體制」（neoliberal

pedagogical apparatus) 的意識型態規訓機制。Giroux也論證，博奕資本主義將造成「青年商品化」(commodity of youth)的現象，商品化的結構將逼迫青年成為猖狂消費文化中的消費者，並將青年的勞動力「物化」(objectify)為可供市場剝削的商品。再者，新自由主義的大學結構開始引入「企業化」(corporation)的經營模式，競逐效率化，減少開支，精簡人力成本，以及追求工具主義思維的卓越。Giroux認為，青年應培養「批判性的公民性格」(critical citizenship)，覺察政治領域中的「自我意識」，建立批判的能動性，包括對話、自我反省、質疑權威與積極參與公民生活。從社會實踐層次來說，作為批判性的青年公民，社會運動的目的即是對抗「博奕資本主義」與「威權體制」的宰制與壓迫，重新點燃對於正義、尊嚴與民主的熱情，重建「民主的承諾」(promise of democracy)與「新的希望感與可能性」(new sense of hope and possibility)。總而言之，Giroux在第四章和第五章進行抽象的結構分析，呼應第二章與第三章的主體受壓迫經驗，並透過「概念」與「經驗」間的相互辯證與討論，梳理「超越」(beyond)與「反抗」(fighting back)結構障礙(包括「殘暴的文化」與「博奕資本主義」)的可能性。

三、本書的「知識論」邏輯

本書的知識體系的建構，有別於以往Giroux所出版的其他書籍，這一本書只有78頁，他清晰地陳述美國底層的青年如何走向被社會拋棄的命運。Giroux主要的關懷仍然圍繞在青年如何從主體的抗爭實踐中追尋「尊嚴」(dignity)、「正義」(justice)、「民主」(democracy)和「平等」(equity)的可能性，他也不斷地強調「批判性的公民資格」(critical citizenship)之重要性，這些論點的理論基礎主要來自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與反資本主義的左派論述。再者，Giroux在書中也諸多提及Bourdieu的文化資本理論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以及W. Mills的「文化機器」(cultural apparatus)，論證習以為常的「文化因素」，亦可能是社會控制的媒介之一，滲透於資本主義所建構的生活世界當中。例如：文中也提出「殘暴文化」(culture of cruelty)，亦即新自由主義的新威權治理將「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轉變為「懲戒式的國家」(punishing state)，並以捍衛國家安全之名，犧牲個人自由。

筆者援引批英國科學哲學家R. Bhaskar之「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的架構，嘗試將Giroux的知識論建構邏輯分為三個層次，包括「社會事實」(social events)、「經驗證據」(empirical evidence)與「形成性機制」(generative mechanism)。首先，Giroux透過自身的經驗與觀察，亦透過媒體的社會事件報導，清晰地指出「可拋棄的青年」就是「博奕資本主義」的產物；換句話說，Giroux將美國式的「博奕資本主義」的存在當作是一個主要批判的對象，理由是：「博奕資本主義」與「可拋棄式的青年」被預設為一種「必然」的因果關係(necessary causal relations)，因此，Giroux提出透過反抗的能動性找回青年主體性，重塑民主結構的可能性，方能翻轉「族群的不正義」(racial injustice)與「階級的不平等」(class inequity)所帶來的壓迫。筆者認為，這樣的必然性邏輯是過於武斷的，是否有其他的壓迫也可能造成「可拋棄式青年」的出現呢？直言之，Giroux將底層美國青年當作必然被壓迫的客體，並未解釋部分底層的青年也可能透過自身的努力，從結構中獲得階級流動成功的機會，享受資本主義的豐碩成果。因此，Giroux並未清晰地闡釋「博奕資本主義」(亦即「形成性機制」)與「可拋棄式少年」的關係，究竟是一種「普遍結構必然」結果，還是「特殊結構的偶然」現象。具體來說，如果論證是前者(普遍結構必然)，Giroux將有更強的說服力提出「反博奕資本主義」的策略；反之，如果是後者(特殊結構的偶然)，是否可以主張透過議會民主路線的「福利制度」與「政策的制定」進行修正彌補，並非要激進地推翻資本主義的結構。再者，Giroux的知識論證結構缺乏「辯證性」的邏輯，作者也未能區分「社會事實的客觀性」與「價值詮釋的主觀性」二者的差異，模糊化「社會事實」(social facts)究竟是「被作者的詮釋建構出來的」(作者主觀的詮釋與批判)，還是「被資本主義的結構生產出來的」(作者客觀的科學分析)，如何超越知識建構的「主觀性」(subjectivity)與「客觀性」(objectivity)的矛盾是作者在論述的過程中所忽略的。作者僅提出博奕資本主義的「墮落性」，例如：具體指出博奕資本主義對於底層青年的影響，以及訴求透過主體的抗拒轉化結構。第三，作者從批判理論的立場挑戰資本主義的壓迫，但是，作者並未分析青年抗拒結構的限制為何，亦未說明為何僅只有少數的青年團體願意抵抗「抽象的博奕資本主義結構」與「象徵性權力」(symbolic power)。筆者認為，文中的知識論述對於青年的能動性

懷抱過於「浪漫化」(romanticising)的想像，缺乏對於「增權賦能的行動方案」(practical actions of empowerment)與「弱勢者建立團結的策略」(building solidarity strategy with the marginalised groups)提出積極的主張。最後，作者對於「可拋棄式青年」概念的建構，主要放在「階級」與「族群」關係的脈絡當中，缺乏對於「性別關係」的深究，例如：不同性別的少數族裔與工人階級之受壓迫經驗與反抗的可能性，「父權主義」(patriarchy)在壓迫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若將「性別」的因素理所當然地放置於「弱勢階級」與「少數族群」的脈絡之下，將無法清晰地表述「誰才是真正的可拋棄青年」。再從階級關係的角度論之，作者也未釐清「可拋棄性」(disposability)的概念生成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再生產的「壓迫過程」(勞動力的商品化)，抑或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壓迫結果」(主體的邊緣化與去政治化)。具體論之，如果將「被拋棄」概念視為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壓迫的過程」，勞動力的商品化將會同時發生在中產與勞動階級的青年。大部分的青年都將在畢業之後進入勞動市場，即為資本主義的無產者，中產與工人階級的青年將被視為是「非對立」的群體；如果將「被拋棄」的概念視為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壓迫結果」，貧窮社區的青年將可能是政策的直接受害者，而中產的青年看似變成新自由主義治理的既得利益者，中產與工人階層的青年將被視為是「對立」的群體。這兩者的差異，例如：不同階級青年的衝突與矛盾，都是Giroux需要進一步釐清與說明的部分。筆者嘗試歸納「可拋棄性」概念的知識邏輯如下：

假設一：博奕資本主義→勞動力商品化→青年成為被拋棄的社會廢棄物（無勞動價值）

假設二：新自由主義治理→主體的邊緣化與去政治化→底層青年成為被拋棄與被規訓的冗員（無存在社會價值）

四、本書的「方法論」邏輯

筆者將繼續延續知識論邏輯的討論，嘗試將焦點轉移至方法論邏輯的分析。本書的方法論邏輯為「歸納邏輯」(inductive logic)與「演繹邏輯」(deductive logic)交替轉換，Giroux在本書中，大量地回憶自身的經歷與觀察反省，將自己

經驗當作是文本的被分析的客體，並嘗試從自身的經驗中歸納壓迫的經驗，這可以視為詮釋的批判反省取向。再者，作者也從歷史的角度反省1970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崛起，「公共教育」（public pedagogy）的運作如何受到商品化邏輯的影響，使得學生從校園的學習主體變成教育市場的消費客體。筆者將從幾個面向分析與質疑本書的方法論邏輯。首先，Giroux「夾敘夾議」的寫作風格，將經驗與理論進行選擇性的嫁接。筆者的疑問是，此類書寫風格是「理論為主體的書寫」（theory-driven narratives），還是「經驗為本的書寫」（experience-based narratives）。若是前者，Giroux是否已經主觀地排除理論無法解釋的經驗，例如：如何解釋底層青年透過自身的努力，仍有取得向上流動的機會，成為新自由主義治理的成功典範；若是後者，Giroux嘗試用經驗證據理解抽象的結構，理論概念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例如：自身與他者的受壓迫經驗如何論證「博奕資本主義」的必然存在。再者，Giroux在文中提出不同的概念解釋不同的經驗現象，但是，不同的概念的「後設假設」（meta-assumptions）皆不同，例如：「歷史唯物主義的商品邏輯批判」與「文化政治的意識型態批判」皆為不同的理論體系與方法論邏輯所建構，如何將兩種理論進行有效的整合，並放置於美國教育體系與底層社區的脈絡，理解「可拋棄青年」的構成。因此，Giroux可能需要進一步解釋「經驗證據」與「理論概念」間的方法論邏輯為何，Giroux若無法爬梳兩者間的方法邏輯，「可拋棄青年」之概念化與理論化的基礎將是鬆動且不穩定的。最後，Giroux在本書中以「規範性」（normativity）的分析為主，具有強烈的「社會主義價值導向」（socialist value-oriented approaches），他站在「反博奕資本主義商品邏輯」與「反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立場，強調「民主」與「平等」價值的實踐，方能促進人類解放。然而，Giroux急於強調「反壓迫」的必要性，卻未能清晰地解釋「鉅觀結構」（macro structure）與「微觀經驗」（micro experience）將如何放置於「規範性的架構」之中。總結來說，Giroux的書寫從「方法論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出發，最後以「方法論的整體主義」（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結束，從微觀的經驗述說，走向鉅觀的結構分析，這看似理所當然的論證模式，卻存在著方法論邏輯的謬誤。具體來說，「方法論的個體主義」重視主體的經驗、意向與行為動機；相對來說，「方法論的整體主義」重視制度與歷史結構的分析。Giroux透過美國

青年「被壓迫經驗」（青年被邊緣化的故事）與「壓迫性的制度與結構」（青年被威權治理結構「規訓過程」與商品邏輯「物化的過程」）進行交替的分析，然而，上述二者的分析邏輯與假設皆不同，Giroux的書寫如何突破兩個對立性的方法論典範，尋找「個體主觀經驗」與「整體客觀結構」的內部與外部的聯繫機制（例如：不同個體經驗的聯繫、不同壓迫結構的聯繫，以及個體經驗與外部結構的聯繫），這是有待探究與深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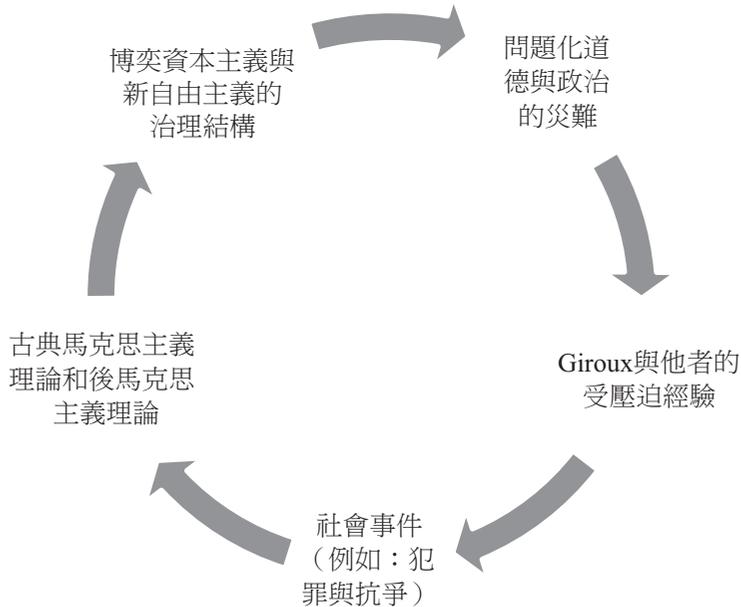


圖1 本書的方法論與知識論邏輯與推論關係

五、本書對於「青年研究」的主要貢獻

上述對於本書的知識論與方法論提出諸多的批判，但是，本書的觀點對於青年的研究仍具有相當的啟發性，Giroux嘗試歸納本書對於青年研究的貢獻，主要可以從三個層面進行探討：

（一）本書具體地陳述美國青年的受壓迫經驗，Giroux將自己的種族化與階

級認同的經驗作為反省與批判博奕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基礎，並投射出美國青年如何在「可被拋棄的時代」努力的掙扎與奮鬥。Giroux在最後兩章，交替地處理「經驗」與「概念」以及「結構」與「主體」間之辯證，並嘗試重新建構理想的民主形式。

(二) 在不同的章節中重新詮釋和理解「可拋棄性」的概念，包括「文化政治的可拋棄性」（第四章）與「經濟的可拋棄性」（第五章）。Giroux在本書中，並非僅聚焦於經濟的壓迫分析，也嘗試從經驗的陳述中抽繹出「文化機制」的規訓與壓迫，以及「文化教育學」（cultural pedagogy）和「公共教育學」（public pedagogy）如何形塑「規訓」的意識型態，並論證「殘暴文化的形成」與「青年的可拋棄性」所具有之經驗與概念的符應性。Giroux在第五章嘗試詮釋「博奕資本主義」如何滲透在底層青年的生活世界之中，並將「可拋棄性」的概念放置於商品經濟的邏輯之中進行討論，其中教育的商品化是新自由主義威權治理用來規訓青年最直接的方式，國家透過教育機制宣傳個人主義的美好，病態化地鄙視社區與公共的價值，強化市場競爭的文化，建構可拋棄式時代的「殘暴的劇場」（theatre of cruelty）。

(三) 本書具體地分析「博奕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治理」與「文化機制」的構連關係，並提出「可拋棄式青年」之概念（意指使用完畢之後，隨時可以被丟棄）。有別於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Giroux透過後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政治分析」，更著重在「權力機制的運作」（operation of power apparatus）與「意識型態的規訓」（ideologically disciplinary machine），包括商品化／市場化的意識型態與新自由主義的威權意識型態如何滲透在「日常生活」與「校園生活」之中。Giroux的「規範性架構」分析也引導讀者從悲觀宿命論的壓迫結構走出來，提出超越與反抗的理念，包括培養批判性的公民性格，以及建構民主的公共領域。

